



森林炊烟



北京出版社

11024

森 林 烟 欣

(散文特写集)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題材广泛、內容多样的散文特写集，选自 1957 年 1—8 月的《人民文学》。这个集子容納了各种不同風格的散文特写，这些作品表达了崭新的时代感情，歌頌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和偉大的国际主义友誼。

森 林 炊 烟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市崇文區龍鬱胡同 3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 095 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27 • 印张：4 10/27 • 字数：86 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统一書号：10071·190 定价：(6)0.40元

目 录

| | |
|-----------------|-----------|
| 無声的旅行..... | 陈白塵(1) |
| 祖国的泥土..... | 袁 鷺(10) |
| 三峽之秋..... | 方 紀(16) |
| 家禽飼養員..... | 王 林(34) |
| 城庄筆記..... | 青 林(44) |
| 黃昏海河邊..... | 谷 嵘(61) |
| 太陽河畔的處女地..... | 秦 牧(66) |
| 森林炊烟..... | 傅 仇(77) |
| 紅色故乡隨筆(四篇)..... | 馬 宁(81) |
| 洛陽遊記..... | 張畢來(97) |
| 傳說(外二篇)..... | 端木蕻良(102) |
| 叶笛集(十一篇)..... | 郭 風(110) |
| 春天頌(七篇)..... | 丽 砂(118) |

無声的旅行

陈白塵

当我走进飞机场的候机室，我感到这是站在莫斯科的門檻上了。

十多天前，作为一个过客，原打算只从这城市的边缘上飞掠而过的，由于意外的机缘，竟让我在这里停下来。从那时起，我悄悄地贴近她，慢慢地理解她，刚刚看清楚她的一个轮廓，突然间，又要离开她了。我不能不珍惜这仅余的时光，打算好好度过这最后的一个鐘点。

在莫斯科的人海里，我和我的同行者像是刚刚学会游水的人，虽然不能游得很远，但已经觉得是“海闊听魚躍”，来去自如了；有时遇到点小波折，也会感到一种惊险的乐趣。比如说，我们不会俄语，在生活上自然遇到些困难，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而且使我们觉得和这城市相处得更加亲密。

一小时以后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候机室里的电视机似乎理解到这仅有的两个中国人的心情，突然播送了京戏“雁蕩山”。这是周信芳先生领导的上海京剧院在莫斯科的閉幕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振奋人心的锣鼓和惊人欲絕的武打，已經把我們和候机室里旅客們的心联在一起了。而从收音机里傳出来的、閉幕式上洋溢着的兩国人民真摯的友誼和惜別之情，在

这十里長亭似的候机室里的我們，就特別容易受到感染。

这最后的一小时是如此迅速地过去了；我們准备向莫斯科告別了，旅客們忽然被通知說：本班航机因故要延迟大約五小時，就是說要到明天早晨五点鐘才能起飞。这对于我們是个好消息，莫斯科在挽留我們了。

但同时也產生了困难。前来送行的王錫貴同志是我們的义务翻譯，他已經被拖累了好几天，應該讓他回去休息了。但是他反問：“你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上哪一架飞机呢？”

我迟疑了一下，說：“不要紧，我們已經有些經驗：隨大溜，跟着別人走。”

可是当我說這句話时，才發現候机室里的旅客們已經一哄而散，不知去向了。

我們在想办法。这时，我才又發現，在一只大皮沙發上坐着一位沒被我們注意到的女乘客：看样子像个大学生，朴实而文靜，正在低头讀着一本厚厚的書。

三个人都不約而同地轉臉向她。王錫貴同志上前打了招呼，問她上哪兒去。沒等到翻譯，我已經从她的神情和清脆地吐出的“北京”兩個字里，知道她的終点站了。我欢呼說：“行了，我們就跟着她走吧！”

她对于我們的請求——在飞机起飞时招呼我們一声——欣然应允了。她并且从大沙發上站起来，以極其爽朗的口齒介紹她自己：她叫里雅。她的丈夫是北京某一个机关里的專家，她正是去北京探望他。

我們把她的名字記下了，她也重复地念了念在她一定認為很古怪的兩個中国人的姓名之后，我們为这一临时的“友好协定”向她說了一声“謝謝”。——这是用俄文說的，但它已經占

了我所能說的俄文的二分之一了。

候机室里不断地吞吐着旅客，而我想起了医生的警告，便抓紧时间在一只椅子上假寐了一阵。可是这已经迟了，倒楣的牙痛终于又把我叫醒了。我连忙服了一包医生要我在“必要”时才许服的药片。但这也迟了，它无论如何已经追不上这不管是否“必要”就越来越猛的疼痛了。

牙疼，在中国是不被认为是什么大病的，似乎连呻吟的权利也没有。更何况这是在国外，我当然很注意这一“国际影响”，只好忍呀，拼命地忍。但可惜我没有在当时照镜子，不知道我那付受苦受难的形象怎么终于掩饰不住，而被人家看穿了。

我在旅客中間低着头穿来穿去，排遣疼痛。突然，我的肩膀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扳住了。一回头，原来是一位红军军官。我发了愣，他是认错人了？

他明明白白是向我說話。不过我很抱歉，除了窘迫地向他摊开两手，摇摇头之外，只有忍住痛向他微笑了。他也回答我一个微笑，并且使用了另一种“国际语言”——手势来提問題了：他用疑问号的手势指指自己的牙，等候我的答复。这一下，我真地笑了，会心地笑了，而且加上了点头。

突然间，又是一只手伸进我們中間来。这是一只女人的手，手里捧着一只打开的小小的铁盒，盒里整整齐齐排着八片药片。我从这位太太的笑容里看出了她和那位军官的关系，便连忙取出一片药片放进口内，以免现出絲毫的迟疑。他們都满意地笑了，我又用俄文說了：“謝謝！”

我轉臉找里雅，想請她对这位军官夫妇表示我的感謝。但里雅已經孩子似地头枕着書本睡着了，我觉得自己慌乱得可

笑。

再轉回身，那位軍官已經和他的夫人挽臂走開，上飛機去了。我只覺得口里沁出來一陣清涼。

早晨五點之前，我們看見四位捷克斯洛伐克旅客回到候機室，便連忙做出發的準備，但他們却在憤憤然議論起什麼來了。其中一位攝影家昨晚就認識了的，是位活躍分子，他可以用僅高於我們的程度的俄語和蘇聯同志們打一切交道，他也可以用類似程度的漢語和我們交談。我們知道一定有了什麼問題，便走了過去。攝影家迎著我們聳肩膀，用漢語說：“九點鐘！”他又補充了動作，扳着我的手表，從現在的5字數到9字，然後張手做了個飛機姿態。

這個突然的變化，使得我們不得不商量一個如何消磨這四小時辰光的計劃。但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交換意見，攝影家已經又從國際旅行社的辦公室跑回來了，手舉一張紙條，向他的同伴們招呼一聲，他們就都提起手提包之類打算離開機場了。

我伸手向攝影家道別。他連忙搖頭說：“不，不，不。”他指指外面，做了個睡覺姿態。然後又點一點人，指着紙條上寫的人數說：“六個人！六個人！”他在國際旅行社辦理的到旅館去休息的通知書上，已經把我們這兩個不會俄語的中國人包括進去了。

這種友誼的关怀，使我們感激得不能加以拒絕，雖然我們最初的打算是並不想在這短短四小時之內再離開機場。

剛提起皮包，我發現不該走了：從道義上說，我們怎麼能够把里雅一個人丟下呢？攝影家對於我的遲疑感到惊奇了，但我沒法用語言來說明這緣由，除了以手勢向這位可愛的攝影家

表示着那位女乘客的存在。

我不知道攝影家是怎样理解的，但他到底是以恍然大悟的神情跑向里雅去了。他用最簡單的俄語和最明快的动作結合起來，連說連比划了一陣。里雅笑了，提起小皮箱加进了我們的行列，而攝影家又以闪电似的速度跑进国际旅行社办公室，把通知書上的六个人改成了七个人。

一出了飛机场，这七人临时組成的国际旅行队的領導权突然落在里雅的手里了。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我所推想的文靜的大学生了。她以活潑而敏捷的动作，先确定了旅館的方向，然后搶先帶路，帮我們叫开了旅館的門。到了旅館，她更像是一个主人，讓我們每人都交驗了护照和飞机票，帮助旅館里管事的老太太分配、安頓了我們每个人的房間、鋪位。而这些工作，一共只花了几分鐘。这使得活躍分子攝影家都失去了光輝。

把我們都安頓好了之后，里雅和旅館里那位老太太开始了一段簡短的對話。里雅在問，老太太則一再地搖头，表示了無可奈何的抱歉神情。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她們的，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猜測：是不是她自己倒沒有鋪位了？我想問她，她似乎也知道我要問什么，只連連揮手，要我上樓去。

才六点多鐘，旅館管事的老太太便以命令式的口吻叫醒了我們。对于这种命令，只有絕對服从，我們在五分鐘之內完成了起床、穿衣、擦臉等一連串动作，便向楼下奔去，怕的是別人都已在飞机上等候我們了。

但在楼梯上我就看見了里雅，她已經裝束整齐，坐在她原来坐的那張椅子上等候我們。我們怀疑加深了，用手勢問她睡了沒有。不知道她到底是真話还是假話，或者根本沒有懂得我

的問話，她只是微笑着点头，而且不讓我再有發問的机会，站起身來反問我們一句，那意思好像是：“就走吧？”

她仍然以領隊的姿态，搶先帶路，向飛機場大踏步前进。積雪在腳底下沙沙作聲，我們像小學生似的緊跟着她。

里雅突然輕輕地驚叫一聲，這好像是一聲口令，我們都立正了。她的帶有檢查性質的一句問話，使我們吃了一驚。但她馬上知道說話是多余的，便在雪地上打開她的手提箱，拿出她的護照來。我馬上向她點頭，並掏出旅館老太太已經還給我的護照，她爽朗地笑了。里雅好像又發了一聲口令，我們繼續踏雪前进。

到达喀山，近十二点了，我們“隨大溜”进了機場的餐廳。

我們對着一份俄文菜單苦笑。在莫斯科的几家餐廳菜單上勉強辨認出的几樣菜名，由於不同的排列，再也找不着了；看樣子它又不是客飯那一組一組排列的，也不能隨便指划一個範圍；在莫斯科的餐廳里使用過的幾個英文單字，在這兒也不生效了，我們陷入了困境。

我干脆放下菜單，用手勢告訴那位很殷勤的服務員，我不懂得俄文，但他還是鞭炮似地發出一連串的問題。我的同伴有點急不擇言了，連連說：“隨便，隨便。”我不能不笑了。

我的笑引起同桌的一位蘇聯同志的大笑，他把服務員拉过去了。我知道他是我們同機的、去新西伯利亞的一位乘客，看樣子是位工人。他對服務員嘲笑了一兩句之後，干脆來個包辦代替，替我們点了菜，解了圍。

蘇聯人對於中國人好像有一個共同認識，以為中國人都愛吃鷄蛋。莫斯科的餐廳里給了我不止一次這樣的印象，而當服

務員捧來煎鷄蛋的時候，我不禁聯想着笑起來了。那位工人同志得意地揚起頭來問我們，那意思好像是“怎樣？”用我所能說的二分之一的俄語答復了他，他就更加得意地大笑了。

吃完飯的時候，工人同志正買了水果回來。不知道他是看我們吃得少了還是出于其它什麼善良的意圖，他堅持着要送我們每人一只在莫斯科很難見到的大蘋果。我想再對他說聲謝謝，但話到嘴邊，又覺得這麼一句平淡的話不足表以現自己的感情而咽下了。這時他也好像要說什麼，可也同樣縮回去了。於是我們都用手勢和微笑來代替了語言。

我們再沒有遭受在喀山這樣的困難了，因為以後每次用餐時，里雅差不多都和我們在一個餐桌上。但这又引起我們新的不安。我們所請求於她的幫助，只是在莫斯科站上的一聲招呼，而現在把我們經常的放在她的照看之下，我們感到一種增加別人負擔的歉意。

我們二人在私下里也曾有過這樣的願望：對於她的照顧應該有相當的回報才是。但我們雖然眼看着她有點咳嗽，而我們沒有藥；也看得出她穿得太少，我們也沒有女衣；即使是表示一下更深切的感謝吧，我們更沒有語言。而這種抱歉的心情正如從莫斯科往東的雪，越遠越下得深了。

第一天，我們在新西伯利亞過的夜。在這兒，我們的經驗主義失敗了。記得從伊爾庫次克飛往莫斯科的路上，是有站必停，停必吃飯；如果進旅館休息，那必定得先後用兩次餐的。這次到站時是夜間十點，居然沒讓再吃飯，——雖然並不餓，——是頗覺意外的。因此當第二天早晨三時被緊急命令叫醒時，我們便直奔餐館而去。可是在餐館門前被擋駕了，機場上

接送旅客的招待員指示我們逕上飞机，这就更覺意外了。

再看看飞机，已經作好起飞的准备，好像就等候着我們了，不由地拔步就跑。

踏上扶梯的頂層時，我看見旅客們都已經坐在座位上等候着，不由得感到抱歉起來。但使我更感不安的是，在机艙門口發現了里雅。在她那由焦急的神情突然改變過來的微笑中，我似呼听到她的話：“你們可來了！”

我把消除这种不安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天从伊爾庫次克到北京的航程中，因为那一段飞行是由中国民航局的飞机担任的。在那里，我可以用主人的身分出現，中国的服务员也一定可以帮助我完成这个願望，至少可以作为临时翻譯，以表示出对于里雅同志的真誠的感謝和無限的歉意了。

从伊爾庫次克起飞前，在候机室里果然遇見了中国的駕駛員們进进出出，我的希望加強了。因此，上飞机时我感到从来没有有的从容，好像已經是个主人似的，最后离开那間門上写有中国字的候机室。而且，出門前又对它投以最后的一瞥，这是与苏联的土地告別了。

在这一瞥中，我發現里雅居然也有疏忽，她那从不离手的一本厚厚的書被遺忘在沙發上了。我馬上追出門，但里雅走在拉長了的行列的最前端，已經踏上扶梯，跨进机艙了，同时我注意到机尾上的国徽，我很失望，这架飞机并不是中国的。

忽然，我看見里雅已經跳下飞机，一撒腿，以賽跑的姿态向候机室奔来了。我知道她为了什么，急忙迎上前去，張手攔住她的去路。里雅一抬头，稍稍吃了一惊之后，看見了她心愛的書，气喘着笑开了，她重复地說着一句最簡單的俄語，因为她知道我完全能听懂这句話。

当时我想，在到北京机场以前，这大概就是我所能为她服务的唯一的一件事了。当然，那时我还可以使用我其余的二分之一的俄语，向她说声：“再见”。

祖國的泥土

——越南隨筆

袁 鷺

紅河波浪哟紅又黃，
彎弯曲曲向越南；
紅河的土地受苦难，
越南的人民在做牛羊……

大約十六年前，一个从云南流浪到上海的同学，教給我这支民歌。那时候，我們都是高中学生。高中應該是放声歌唱的时代，在日本帝国主义侵佔下的上海，我們这些空有滿怀壯志的年青人，却都不自觉地染上一些灰黯的色彩。但是，这支民歌那样强烈地震撼我們的心灵，也还由于对受苦受难的越南人民，我們是感同身受的。那位朋友說：这支民歌在中越边界到处流傳，究竟是中国民歌还是越南民歌，他也說不清。

以后，每当哼起这支歌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浮现出这样一幅圖景：一望無邊的紅河岸上，炙热的陽光下，一对农家夫妻，背着木犁，蹒跚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大顆大顆的汗珠落在泥土里，也顧不上擦一擦。走着走着，其中一个疲憊不堪地倒在

地里。他隨手抓起一把泥土，用手揉着，突然，热淚盈眶了。
多肥多香的泥土啊！他为这泥土流尽了血和汗，却得不到一星
点兒泥土的賜予。他無告地望着天空和波濤滾滾的紅河，長長
地嘆息着，站起身来，再往前走。歌声就响起来了：

紅河波浪喲紅又黃，
弯弯曲曲向越南……

歌声飄蕩在紅河兩岸的田野上，伴随着紅河波浪流向远方……

这种想像是从哪兒来的，我自己也說不清楚，那时候，关
于越南，我知道得很少很少。这支民歌，却使我突然好像熟悉
了这个国家，并且深切地关怀它。

十六年后的今天，我有机会漫游在肥沃的紅河兩岸，聞到了
令人沉醉的泥土的芳香。在我眼前是一幅幅完全新的圖景：
人們愉快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来来往往；在龙眼树蔭，一羣妇女
在談笑着，一面嚼着檳榔；公路上，不时有汽車或軍用載重汽
車馳过，树旁的孩子就向它們鼓掌欢呼；在清清的小河边，姑
娘們婉轉地唱着北宁民歌……

受苦难、做牛羊的日子，像紅河的水一样，不再回头了。
但是我过去常常想起的那幅圖景，却依然繚迴腦际，并且，由
于越南人对祖国的泥土、对肥沃的土地的那样深厚的、無可比
拟的感情，使我更深地了解了越南人的心……

在越北自治区展览会的革命事迹室里，陈列着用錦盒裝着
的一撮泥土。說明牌上写着：“祖国的泥土”。

一九四一年，旅居在中国的胡志明同志秘密地回国，根据
当时越南形势的变化，回去加强革命活动。在回国的路上，胡

志明同志步行越过許多高山，許多河流，許多人迹罕見的森林，終于安全無恙地到达边界。他國內的伙伴們在边界上等着他。当这位离开祖国好几年的革命領袖兴奋地握住战友們的手的时候，有人低声告訴他：

“已經到了祖国的土地了！”

于是，胡志明同志的脚步迟疑了。他凝視着辽远的山林和原野，仿佛从那一脉远山背后，整个多灾多难的祖国都展現在他的面前了。过了一会，他俯下身，抓起一把泥土，拿到嘴唇边，吻了一下；那么輕，又那么深情，就像吻着母亲的面頰。然后，他把泥土放在口袋里。

人們看見他的眼睛潮潤了。

这一把泥土就一直由胡志明同志自己保存着。后来，战火蔓延到这里，机关轉移，胡志明同志也到別处去了。他把泥土放在一位老同志的家里。托他們繼續保存。当时，这一把泥土的故事到处流傳，可是沒有人知道它到底落在哪里。那一家受了胡志明同志的囑托，像保护珍宝似地藏着这把泥土，一直保存了十五年……

听到这个故事，我們的眼睛也潮潤了。这何尝是普通的泥土，这不正象征着越南人民的純朴的、热爱祖国的心！

越南朋友接着告訴我們：在殖民者的鎖鏈下，过去許多不得不背井离乡的越南人，在离开祖国的时候，都帶上一撮故乡的泥土。当他們飘洋过海，走遍天涯海角，只要一看这撮泥土，就会想到被殖民者蹂躪的祖国，想到做牛做羊的同胞。

他深沉地說：

“那撮泥土，就是向着祖国的心！”

如今，越南人把对祖国的泥土的深情摯愛，溶化在对南半

部人民的怀念，溶化在争取祖国南北统一的斗争中了。

看吧，这是一个雕塑：一个南方战士要集结到北方来了，一位老大娘和一个小姑娘在送他。妹妹抱着一只大椰子，也許她特意选了一个最大的，好讓远行的亲人一路都不会感到口渴。母亲呢，手里却捧了一包家乡的泥土。她的眼睛，凝视着战士的脸。许多話，许多嘱咐，许多心事，都在这一包泥土上了。

在河內的一些公共場所，我看到一幅宣傳画：画的構圖同这塑像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加上了蔚藍的大海和高大的椰子树作为背景。此外，多了几行詩：

你到了北方，
千万要告訴胡伯伯：
在这一塊泥土上，
只有一面红旗！

雕塑和宣傳画的作者，都沒有說明这位善良、慈祥的老大娘，是不是就是战士的母亲。但是，这豈不是一样嗎？所有南部的老大娘，都是南方战士的母亲。这包泥土，就是母亲的心，就是一千二百万南方父老的心！

这难道是别的什么泥土嗎？这是你們曾經在上面誕生、成長，在上面劳动和战斗的泥土！这泥土，曾經像母亲一样地哺养过你們，保护过你們。你們走后，土地就要遭难了。到北方去的孩子們，帶去这包泥土吧！讓它在你們的怀里，永远温暖、燃燒着你們的心！看見它，你們就会想起南方，想起南方的土地，想起南方的还在水深火热里过日子的人民！